



引用格式:李哲懿.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解决及应对[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1):24-30.

中图分类号:D26;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1.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1-0024-07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解决及应对

The solutions of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dealing with i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李哲懿

LI Zhe-yi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认同逐渐成为我国当下一个比较突出的现实问题。当下的文化认同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困境在文化领域的必然映现,其根源在于中国近代落后的社会发展及外来文化的入侵,其表现是对优秀传统文化淡漠,对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文化价值有怀疑。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认同问题历来重视,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将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抓手,着力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文化强国战略,促进国民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重建工作任重道远,要务所在是找到培育先进文化、重构文化认同的正确路径。为此,我们不但要立足本国实际,充分重视继承和发扬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合理吸收和充分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既立足于自身实际,又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且具有凝聚力、感召力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

文化认同;

文化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收稿日期:2015-11-12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资助项目(2013-YXXX-15)

作者简介:李哲懿(1984—),男,河南省郑州市人,河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唯物史观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民族精神的延续、传统文化的继承,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性。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机,使国人对传统文化价值产生了质疑。很多仁人志士在东西方文化价值的比较中,希望找到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兴盛。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当前,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文化认同问题、信仰问题已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对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唯物史观高度,认清形势,正视挑战,正确处理文化认同问题,努力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一、文化和文化认同的内涵

直面文化认同问题,首先需要我们深刻把握文化的内涵。文化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要给它下一个严格的定义非常困难。古往今来,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一直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从内涵和外延等各个方面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如何定义文化、解释文化现象仍充满争议。但文化的核心内容非常明确,就是对社会存在集中反映的一种价值体系、一种价值观。依照唯物史观,文化是在人们的劳动活动中被逐渐创造出来的,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文化。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既包括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有形物,也包括社会历史积淀的无形物。正是如此,文化与意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文化是意识的前提和基础,意识则是文化

的核心和本质。“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72}也就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生活过程。文化和意识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受生产方式制约的,而这种生产方式是历史的、具体的、实践的。

文化与经济是相互促进、紧密联系的。“经济”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 *oikonomia*,其本意是家务管理,后引申为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国民经济的总体等。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经济就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在内的经济活动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如果说经济是社会的“躯体”和社会发展的“硬件”,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那么文化就是社会的灵魂和社会发展的“软件”,为经济这个“硬件”提供发挥其功能的方法和手段。没有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的繁荣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没有文化的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将道路崎岖,充满变数。一个只注重发展经济而不重视文化建设的国家,注定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只知道积累物质财富而不重视精神财富增长的社会,注定是昏暗的;一个只诉求利益而不重视道德支撑的市场,注定是混乱的。因此,经济和文化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文化作

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总体上稳中向好、稳中有进,但受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一些长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在文化领域就出现了文化认同问题。文化认同是在共同的民族血缘、宗教信仰、价值观、伦理道德体系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民族国家体现其存在意义的重要依据。^[3]文化认同是个体对一种群体文化的体认,是个体接纳群体文化、被群体文化影响的过程。相较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波动性较大,影响文化认同的内涵和外延条件较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传统习惯、域外文化冲击等都会对文化认同产生很大影响,因而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也更加复杂。但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认同一旦确立,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同质的文化认同,即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共鸣,将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提供精神动力,为抵御腐朽外来文化的入侵提供坚实保障;而对异质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价值体系的认同,足以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破坏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可以说,文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是反映价值体系,文化建设本质上就是道德秩序的建设、价值体系的重构。文化认同问题就是价值认同问题。

二、中国当下文化认同存在的问题及根源

就我国当下文化认同存在的问题而言,主要是旧的道德秩序崩溃了,新的道德秩序还没能建立起来^[4]¹⁴⁸,往往是用外域文化代替传统文化,怀疑、批判传统文化和既有的社会道德价

值规范。1990年代初,一本美国杂志曾经提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性,……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4]²¹⁹对以反映民族精神和民族风貌为主要特征优秀传统文化的淡漠,以及对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怀疑,业已成为当前我国文化认同不容忽视的问题。

当前中国文化认同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关头,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文化认同问题因而产生。面对国家的贫弱,思想文化界的仁人志士围绕救亡图存和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从最早的“中体西用”到后来的“西体中用”,从最早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到后来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等,这些争论的实质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价值体系的问题——中国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传统价值体系还是选择新的西方价值体系。可以说,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根源于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发展。

就现实层面看,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被逐步淘汰,促进经济更加快速发展的生产关系正在逐步形成,旧有的利益格局被新的利益格局所取代,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突出化、利益冲突明显化的客观现象日益显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益问题便突显出来。^[5]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变化。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化既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前提,又是意识形态发展的

结果,新的意识形态辐射和穿透于文化的各个方面,也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差异性的新趋势,传统的文化体系受到挑战。

此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下的文化体系。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迅猛发展,特别是大众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文化交流突破了传统疆域的限制,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交往的形式和内容都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交往的主体从单一化变为多元化,交往的对象从实体化转向虚拟化,交往的手段从机械化转到智能化,交往的内容从经济贸易为主转变为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全面联系。而交往形式的发展带动。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同时,外来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必然会对传统生活习惯、民族文化产生冲击,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应当警惕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自由竞争的旗号,依托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发达的文化产业为基础,利用便捷的大众传媒工具,输出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使落后国家和民族逐渐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依附于他们统治。^[6]正如马克思所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1]86}依靠掌握的文化话语霸权来影响别国文化,进而潜移默化地渗透、控制其意识形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贯做法。曾经辉煌一时的苏联,最终走向解体、崩溃的深渊,其意识形态的西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可见,当前中国文化认同问题的出现有其复杂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从历史层面上看,中国经历了多次文化变迁,对民族传统文化重视不够;从现实层面上看,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调整加深了文化本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矛盾;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策略冲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剧了中国文化认同问题。文化认同问题对我国社

会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对我国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不小的干扰,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错位。正是如此,在对待外来文化这一问题上面,我们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如果对外域文化不加甄别地全盘引进,必将对我国的民族文化造成严重冲击,进而破坏我国的传统文化价值,消解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造成文化认同危机,甚至会演变为政治意识形态合法化危机。

三、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认同问题的破解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民族复兴道路的选择上,中国人有过彷徨和迷茫。正当中国人在黑暗中探寻方向、寻找前途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7]。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8]。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回答西方的先进文化要不要中国化的问题,由此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序幕。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通过不断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不断总结革命经验,才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9],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体现出很强的民族特性,蕴含着无穷的思想魅力和生命活力。^[10]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的文化思想解决了中国文化认同的时代境遇问题。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一方面,他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另一方面,他提出文艺要百花齐放,学术要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些文化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趋向,又批判地继承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伟大的成就,不仅是因为理论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把先进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因为他们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在重构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

“一穷二白”曾经是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真实写照。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严肃而艰巨的新课题。“邓小平是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参加者,在毛泽东逝世后成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总设计师。”^[1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其文化建设理论的核心。邓小平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这一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邓小平的文化理论,主张吸收国内外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放松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同时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国际地位、国际影响显著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它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理论旨趣是对邓小平文化理论的继承和丰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新的阐释,增强了大众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凝聚了人心,使共产党人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和谐文化理

论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鲜明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养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13]和谐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它为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精神动力。

新时期,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交锋的新态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映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意愿,以“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核心,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问题,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就是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体现了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要求和丰富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个人的精气神能不能振奋,一个国家的精神生活是否健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有正确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促进国家的安定团结、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振奋人们的精

神,增强全民族的精神纽带,以及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结论

当前要解决我们的文化认同问题,其核心任务就是要创造出一种建立在自己文化价值基础上的、适应时代要求并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具有凝聚力、感召力的新价值体系、新价值观。优秀的西方思想,精华的传统文化,都应该是这个新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使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历史和实践已经表明,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找到了培育先进文化、重构文化认同的正确路径,并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从而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易,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易。”^[14]构建文化认同,既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文化,也不是绝对地排斥一切外来文化,而是要在保留民族风格、中国特色的同时,勇敢地迎接新时期价值观念的挑战。因此,我们应以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基础,积极吸收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新价值,总结已有经验,用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出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反映世界发展大势的文化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 [3] 赵建英. 文化认同危机与建构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紧迫性[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2): 87.
- [4] 李慎之,何家栋. 中国的道路[M].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
- [5] 王伟光. 利益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 [6] 萨米尔·阿明. 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M]. 高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62-163.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1471.
- [8]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C].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
- [9] 王怀超,秦刚.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27.
- [10] 田克勤. 毛泽东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 [12] 郑必坚.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3.
-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学习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0:6.
- [1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C].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16.

(上接第23页)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3] 陈立新. 人学研究视点刍议[J]. 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20.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0.
-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2.
- [7]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8] 王南湜. 马克思的历史概念[J]. 哲学研究,2007(10):4.
- [9] 陈曙光. 直面生活本身——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3.
- [10] 钟明华,李萍.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的现代人生问题[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9.
- [11] 陈立新,李齐. 从感性活动出发开启的哲学任务[J]. 东岳论丛,2011(4):47.
- [12] 高清海. 市场经济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J]. 哲学动态,1995(2):19.